



十八世纪 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

〔苏〕维·彼·沃尔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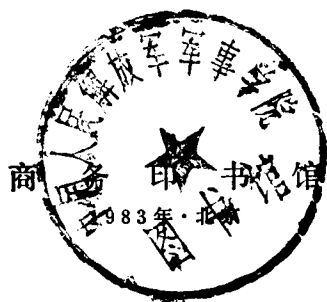
商 务 印 书 馆



十八世纪 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

〔苏〕维·彼·沃尔金 著

杨 穆 金 颖 译



В. П. Волгин
**РАЗВИТ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ВО ФРАНЦИИ В XVIII ВЕК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7

根据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 1977 年版译出

**十 八 世 纪
法 国 社 会 思 想 的 发 展**

〔苏〕维·彼·沃尔金 著

杨 穆 金 颖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 3017·349

1983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55 千

印数 9,100 册

印张 14 7/8

定价: 1.85 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维亚切斯拉夫·彼得罗维奇·沃尔金(1879—1962年)是苏联著名的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08年他写了《十八世纪的革命共产主义者》(《梅叶及其遗书》)一文,这成为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活动的开端。沃尔金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主义思想史,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史。除了本书以外,沃尔金的主要著作有《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1925年)、《社会主义史论丛》(1923年初版,1935年第四版)、《社会主义思想史》(1928—1931年)、《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政治思想》(1940年)、《法国空想共产主义》(1960年)等。

本书出版于1958年。在本书中,沃尔金不仅介绍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卢梭等的社会学说,阐述了十八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如梅叶、摩莱里、马布利的社会主张,而且还介绍了一些我们过去很少了解的重要思想家,特别是空想共产主义者德尚的社会学说。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沃尔金一生研究法国社会思想发展史的一个总结,它提供了不少有助于我们较系统全面地了解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资料和线索,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法国社会思想作进一步的研究。

本书第一、二、三章和第五章第一、二、三节由杨穆翻译;引言、第四章、第五章第四、五节、第六章、结论和后记由金颖翻译,杨穆校订。书末人名索引是由译者编写的。

1982年11月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奠基人	7
前提和传统	7
伏尔泰	18
孟德斯鸠	44
第二章 经济学派	73
重农学派	73
杜阁	92
奈克尔	98
第三章 百科全书派	106
狄德罗和《百科全书》	106
霍尔巴赫	139
爱尔维修	182
第四章 民主派和平均派	220
卢梭	220
兰盖、布里索	264
马拉	276
第五章 共产主义理论和合作制方案	295
梅叶	297
摩莱里	325
马布利	351
德尚	370
合作制方案	385

第六章 革命前夕	392
抨击性文献	394
政治激进主义	400
平均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	421
结束语	431
作者后记	437
参考书目	438
人名索引	454

引 言

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思想史，首先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蓬勃发展和空前普及的历史，是在思想上准备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

在西欧，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些基本因素远在十八世纪以前即已产生。十四至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即已具有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这个新阶级的情绪和抱负的鲜明特征。在人文主义中，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的、世俗的世界观用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思想来反对封建时代的教会权威，用对人世间各种要求、欲望和享受的乐观的肯定来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道德。人文主义赞美独立自主地创造自身命运的自由人。人文主义为了消除人们意识中的那个由宗教虚构的彼岸世界，为了把人世间的现实生活摆在人的利益的中心而做了不少事情。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和在革命过程中为社会利益和政治纲领而进行的斗争，大大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的英国思想家，对资产阶级政治观念的形成作出了不少贡献。但是只有在十八世纪，在革命前的法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才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和臻于完善的境地。十八世纪是资产阶级思想发展的顶点。

阶级意识的发展过程是不平衡的。当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无法在旧的社会结构的框子里继续发展时，也就是在革命前的时期或革命时期，阶级意识就会得到最急剧的发展。在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正好处在它的阶级意识的这种急剧发展的阶段；因此在我们看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各个方面形成的过程，在十八世纪表现得最为明显。

当资产阶级面临同封建专制制度的决战和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建立必需的思想体系时，似乎要把以前各个世纪的成就都综合在一起，同时却又毅然决然地同旧的、封建社会的世界观一刀两断。社会关系的变化和资产阶级地位的提高反映在生活和思想的各个方面。一个新的、正在取得统治的阶级，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富有人生乐趣的道德和对世界的新的认识。关于世界、人、社会 and 国家的新的观念，正在不断发展和巩固，新的资产阶级的趣味和要求，正在渗入到艺术创作中去。十八世纪中叶（四十至六十年代）的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加紧创立企图对现实进行全面批判和预示未来发展道路的哲学、经济和社会理论。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些主要的著作、《百科全书》、重农学派的经济著作、卢梭的论文和小说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或开始出版的。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从这一巨大的工作中得出的实际的、按其含义来说是革命的结论正在不断成熟，行将到来的革命的具体政治要求和口号也在不断形成。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过程，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内部的情绪的种种细微差别。在十八世纪中叶，温和的反对派倾向，即主张同旧世界的势力妥协的倾向还很强大。重农学派的“合法专制制度”，伏尔泰时而赞成英国宪章、时而拥护“开明”君主制的摇摆态度，以及充满了“妥协精神”的孟德斯鸠的学说，都足以证明这一点。这些倾向直到革命前夕仍保持着一定的影响。一些依靠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派别，甚至在革命时期还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里竭力主张同君主制妥协。这些温和的反对派似乎组成了反封建阵线的右翼。而一些代表城乡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利益和情绪的代表，则组成了这一阵线的左翼。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处境关系，对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的缺陷感受较深，所以对这种缺陷采取的态度也就比较激

烈。它们为十八世纪法国的学术界带来了一股独立的清新气流。在十八世纪从小资产阶级中涌现出了最后一批大理论家，如同革命时期从这一阶级中涌现出最后一批大政治领袖一样^①。同卢梭和马布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激进的政治思潮，由于革命的临近而日益壮大，影响也越来越大。杜阁改革活动的失败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当然，封建反动势力也有力地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情绪的高涨。

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发展道路不仅取决于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的具有不同地位和思想情绪的派别，而且还取决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其他因素。法国资产阶级在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并不是单枪匹马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落后状态，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的各种政治形式之间的矛盾，不仅影响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影响到下层居民的物质福利，常常使他们陷于完全贫困的境地。如果说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适应（的确也曾暂时适应过）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条件的話，那么，对于农村的贫民、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这种适应的途径是没有的。在法国人民的这些阶层中，革命情绪一年比一年高涨，这种革命情绪仿佛构成了这样一种背景，如果忽视了它就会无法理解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发展的过程。

十八世纪的法国工人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当然，大革命风暴的临近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情绪上。我们知道，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到处总是和无产阶级前身的多少独立自主的运动同时发生的。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是如此，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如此，十八世纪在法国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早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社会乌托邦思想就在这

① “在1789年，小资产阶级还能成为伟大的革命者；到了1848年，他们已是可笑而又可怜……”（《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534页。）

个基础上产生了。在十八世纪，无产阶级前身的还很朦胧的社会愿望成了产生一系列捍卫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著作（马布利、摩莱里）的动力^①。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理论虽然也是思想发展中的一股独立的潮流，并在社会思想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却没有起实际作用，也没有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革命前的时期，社会主义始终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空想。只是在革命的末期，我们才看到巴黎平民群众在共产主义口号下所发动的独立自主的运动——所谓的“巴贝夫的密谋”^②。

因此，资产阶级在十八世纪还没有感觉到来自无产阶级方面的危险。资产阶级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之间的界限，不象把他们联合起来的那种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共同要求那样来得明显。把封建制度当作主要的共同敌人的概念，不仅是资产阶级社会政治观点的特征，而且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情绪的特征，如果没有人民群众，要通过革命来推翻封建制度是不可能的。因此，尽管在资产阶级利益和社会下层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使资产阶级不仅作为争取自身的阶级利益，而且也作为争取全民利益的力量而出现的前提，还是存在的^③。正因为如此，这一斗争才有这么大的历史意义。在准备消灭封建制度的时期，资产阶级完成了一番巨大的进步事业，这一事业是法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需要。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这种特殊状况，必然会在它的思想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页。

② 即“平等派的密谋”。这是发生在法国的空想共产主义运动。1796年在巴贝夫的领导下，在巴黎组织了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平等社”，它企图建立实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大国民公社”。这一秘密计划于1796年5月泄露，巴贝夫和他的一位战友被处死刑，其他的密谋者都遭到了流放。“平等派的密谋”是正在形成的法国无产阶级争取它当时尚未明确意识到的自身利益的反映。——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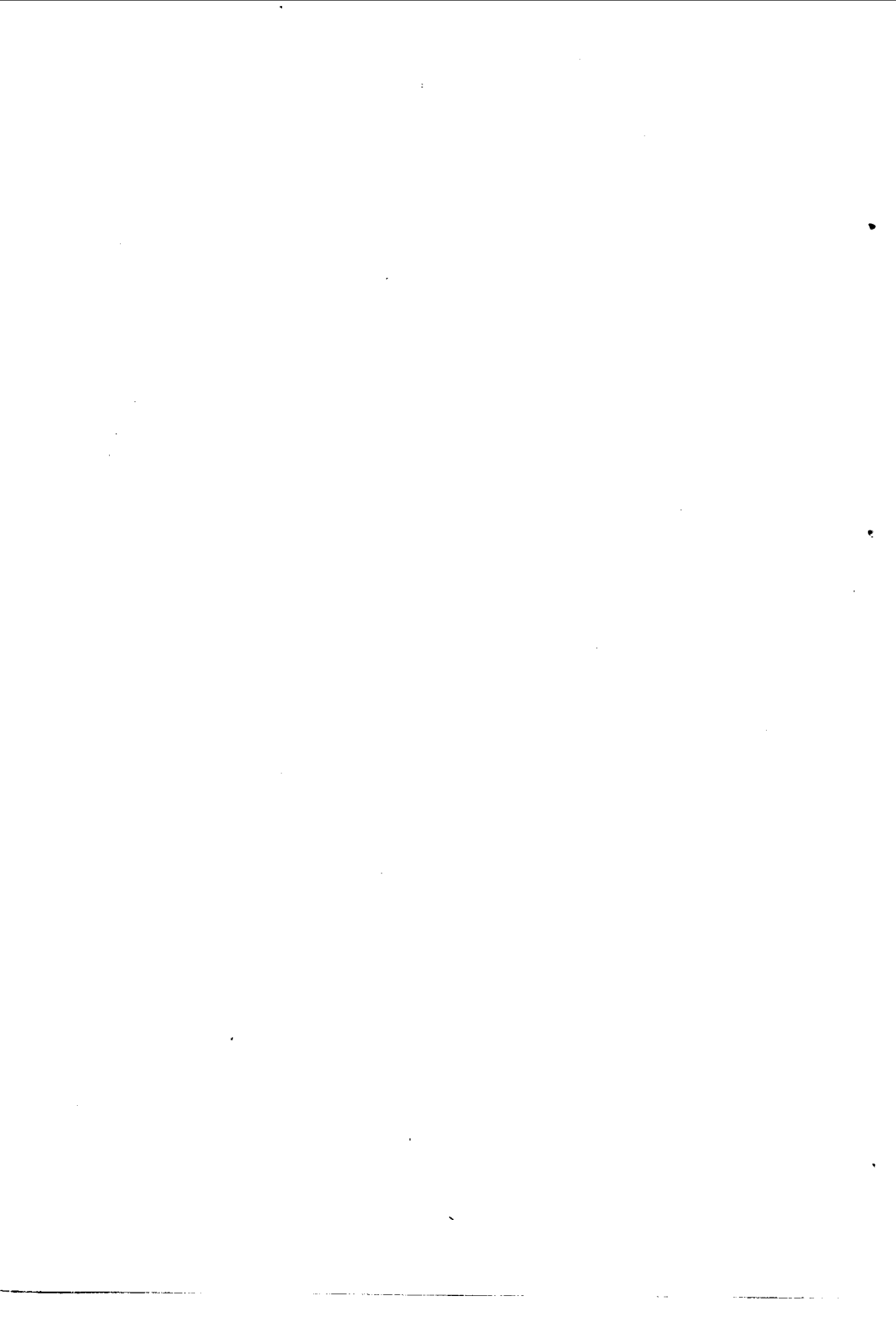
③ “进行革命的阶级……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页。）

著作中反映出来。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由于对无产阶级无所畏惧，又由于受到自己所起的全民领袖作用的鼓舞，因而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思想的优秀代表们所特有的那种同旧传统决裂的勇气和决心，以及那种发展新原理的彻底性和激进态度，就是由此产生的。在革命以后的时期，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就不再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了。

当然，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毕竟有它的局限性，当我们在研究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时越是接近社会改造的实际问题，就越会觉察到这种局限性。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虽然在理论问题上和在批判旧制度的基础方面表现了非凡的勇敢，但是按其阶级本质来说，它在关于未来的社会制度的概念方面却不能越出资产阶级关系的界限。这种状况决定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所特有的矛盾：在为全民利益而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它提出了一些似乎要把任何维护剥削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制度连根铲除的理论原理；但是由于它忠于本阶级的利益，因此它提出来的实际上仍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了的阶级社会而已，在这种社会里不可避免地保持着剥削制度，虽然它已不再具有封建的形式。毫不奇怪，资产阶级所宣布的“理性的和永恒正义的”王国，归根到底不过是理想化了的资产阶级王国而已，而资产阶级所宣布的自然权利，不过是资产阶级所有权而已^①。

只有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才不会有这种矛盾，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完全消灭阶级和人剥削人的制度，因为它的利益是和全人类的利益完全一致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页。



第一章 资产阶级思想 体系的奠基人

前提和传统

十八世纪法国的社会制度，是正在衰颓的但却紧紧地抓住统治权不放的封建主义的各种因素，同已经牢牢地站稳脚跟的资产阶级结构的特征相结合的产物。王家的和享有特权的手工工场的大工业，同行会分庭抗礼，并不顾行会的阻碍而成长壮大，一些一开始就不受行会约束的新的生产部门也不断发展起来。工商业中的资本不断增加，劳动力开始在大工业企业里集中。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不顾重重的关卡阻碍而发展着，大城市也在发展、改建和富庶起来。富人阶级（不仅显贵，而且还有资产阶级上层——包税人、国家供应商、批发商和大手工工场主）的奢侈越来越肆无忌惮，追随他们的是逐渐破落的农村贵族。找不到工作的劳动贫民在城市里越聚越多。手工业者陷入更加依赖包买商的地位，老早就已钻入行会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精灵，正取得日新月异的成就。

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关系不能不对农业产生影响。还在十七世纪时观察家们就已指出法国农村中正在开始的农民分化的过程。从普通的农民群众中分化出了农村的资产者阶层，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或半无产阶级的农村贫民的队伍也在迅速壮大。在封建制度的条件下，剥削农民是地主统治阶级和专制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贵族和同贵族紧密地勾结在一起的僧侣特权阶层，靠剥削农民的劳动为生。使农村不胜其苦的封建主的压迫和国家

的苛捐杂税的压榨，在十八世纪丝毫没有减轻。恰恰相反，新的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使地主和国家增加了对货币资金的需要。一部分土地贵族由于缺乏资金，没有可能适应新的经营条件，因而零星地卖光了自己的土地；绝大多数贵族则力图通过巧立新的和恢复旧的苛捐杂税的名目，通过尽可能更充分地利用封建权利（封建反动势力）的办法来谋求出路。这就必然导致农村的普遍贫困化，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业的集约化造成无法克服的障碍。与此同时，领主的传统封建管辖权的残余仍然存在，农民经济缺少法律保障，国内某些地区还保留着农奴制的残余。当时已经腐朽的封建制度，作为一种麻痹经济发展的一切可能性的力量，它的反动作用在法国农村表现得特别明显。

虽然在十八世纪已经可以看到土地所有权从贵族转移到第三等级代表人物手中的某些现象，但是不仅城市资产阶级，而且连正在出现的农村资产阶级都宁肯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工业而不愿投入农业。资金的缺乏使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成为不可能。当富裕农民的数字在农民群众中所占的百分比微乎其微的时候，贫农的数字都在增长，他们的状况日益恶化。对于许多贫农来说，他们牢牢地依附着的那一小块土地已经不再是他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了。他们之中的一些人通过为“手工工场”生产而在所谓的家庭工业中找到了工作；另一些人则落到了赤贫的地步。在革命前夕，法国农村充满了在经济体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农业中成为“多余的”而在工业中又用不着的贫困的失业者。贫苦农民的愤怒和怨恨情绪达到了极点。

在城市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中也充满了同样的情绪。这个时期的雇佣工人大部分都出身于农民或贫穷的小市民，备受残酷的剥削，没有组织起来，因而也就无法捍卫自己的利益，他们不可能不敌视那种使他们注定要从事力不胜任的劳动和忍受困苦

生活的社会制度。

资本主义关系在一定的限度内，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内部成长起来了；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当时也遇到某些障碍的话，那么这种障碍或者是被对付过去了，或者是在不破坏旧制度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被克服了。君主专制制是在封建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作为一种最符合当时业已形成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政治形式而产生的。恩格斯在谈到这个时期时说：“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君主专制制……使贵族和资产阶级彼此保持平衡……”^①。因此君主专制制似乎充当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调停者。它对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所采取的表面上的独立性，为资产阶级美化专制制度打下了基础。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妨害统治阶级的利益及其政治机构——君主专制制的限度内，封建专制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通常的确是以正在萌芽中的资本主义保护者的姿态出现的。科尔伯执政时代在法国得到最彻底发展的重商主义^②的经济政策的社会意义就在这里。一位研究者把重商主义制度叫做临盆的资本主义的接生婆，这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由于封建主的反抗，甚至连科尔伯都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纲领。尽管如此，这个纲领的某些组成部分，如“谷物贱价政策”和适当调整谷物贸易政策，禁止性关税政策，对工业实行硬性规定，力图扩大殖民地和掠夺国外市场，对十八世纪的政策仍然具有指导原则的意义。君权从重商主义原则出发，认为干与工业生产的进程是自己应尽的职责，它规定劳动的条件和产品的质量。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

② 重商主义是十五至十八世纪许多欧洲封建主义国家用以促进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的经济政策。此外，重商主义也被理解为反映商业资本利益和论证国家的重商政策的经济学说。——译者

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封建贵族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社会作用的增长，专制制度所依靠的那种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正在逐渐消失。君主制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治形式变成了障碍，资产阶级社会为了能够自由地生存和发展，必须消除这种障碍。君主制的社会基础缩小了，它的威望下降了。还在十八世纪初，政府的保护关税政策就已开始引起很大一部分业已壮大和巩固的资产阶级的抗议——保护关税政策是资产阶级在婴儿时代不可或缺的襁褓，现在被当作是一种桎梏了。资产阶级开始要求粉碎束缚贸易的枷锁，消灭窒息贸易的封建割据的残余，它开始懂得，在农业由于遭受封建贡赋和徭役的束缚并被捐税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而退化的状况下，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它的利益和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关系之间的矛盾。

君主专制制本身就是封建主义的产物，它无力消除封建制度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之间的矛盾。相反，它不得不对那些破坏封建制度基础的企图进行最坚决的反抗。与此同时，敌视现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力量，已经成长起来了，而且它们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经常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把国家弄到民穷财尽地步的路易十四的“伟大统治”的末期，在法国就已充满了这种不满情绪。由于摄政王^①和路易十五的庸碌无能和荒淫的统治，这种不满情绪就更加加深和尖锐化了。整个这一时期不仅标志着法国一些城市和乡村中人民愤怒情绪的此起彼伏的爆发，而且还标志着更广泛和更有组织的人民起义的尝试（短衫党人起义^②）。在这种社会情势下，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政治思想家们详尽地探

① 指奥尔良公爵菲利普（1674—1723年）。路易十四死后，他于1715至1723年任路易十五幼年时的摄政王。——译者

② 1702至1704年法国南部农民和城市平民反对路易十四的起义，史称短衫党人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于封建压迫、捐税繁重和宗教迫害而引起的。——译者

讨了符合新的社会要求的关于社会和国家的新概念，关于它们的任务和合理形式的新概念。

* * *

十八世纪法国专制制度的官方政治理论，是还在黎塞留时代就已形成的无限君权论，这种权力似乎是国王们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人间的君权类似天上的神权；国王是上帝的有血有肉的形象，是上帝的代表。国王除了天生的责任感以外，他的意志没有任何限制。作为臣民的个人必须绝对服从。臣民的利益完全服从作为最高准则的国家利益。如果同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个人只能用“祈祷和忍耐”来对待这一准则。体现国家全部力量的神授的君权，实际上就是一种专制权力，虽然它在理论上回避这个字眼。1776年路易十五对高等法院^①宣称：“君权仅寄于我一身，议院仅以我的名义存在和拥有权力；立法权仅属于我一人，任何人不得分享也不受任何约束；整个公共秩序皆自我出。”^②

早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在法国的政治著作中就已能看到对这种被宗教神圣化了的专制制度的抗议。当时的反对派著作继承所谓的反君主专制派^③的传统，同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理论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在这些反对派的著作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对政府的税收政策和封建剥削的大胆批评，以及对法国农村中触目惊心的贫困现象的鲜明评述。这里已经有了关于受法律约束的“合法君主制”的概念，关于限制君权和保护个人权利的思想，关于人民

① 路易九世统治时期（1226—1270年）推行司法改革，凡王国内最重大的诉讼案件，都应由特设的司法机关即由御前会议分设出来的不久以后命名为“高等法院”的最高审判机关处理，从而加强了王室法院的重要性。当时的法国高等法院兼具议会性质，主要由贵族代表组成，可以讨论国家大致，并对国王的措施提出异议。法国的高等法院一直存在到1792年。——译者

② 罗肯：《十八世纪法国的社会思想运动》，圣彼得堡1902年俄文版，第274页。

③ 反君主专制派是指十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初西欧的一些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作家，他们论证了反对暴君斗争的合法性。——译者